

谁的上升空间受到了挤压：收入流动性角度的分析^{*}

刘志国 马 健

内容提要：收入流动性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收入流动性的下降必然会使社会结构僵化，使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上升通道堵塞。本文在 CHNS 数据的基础上，以纵向权重调整了纵列数据的磨损问题，以调整后 Shorrocks 指数、平等化指数、Dickens 指数三种方式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在 1989—2011 年期间流动性水平存在着下降的长期趋势。其中，中等阶层上升的空间受到最大影响。城镇居民、国有部门、无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出现净向下流动。非国有部门职工流动性程度虽然较高，但是较高的流动性带来收入风险上升。

关键词：收入流动性 Dickens 指数 流动性的质量

一、引言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某一时点上截面的收入分配结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收入分配结构的动态变化，即收入流动性问题。流动性反映了社会不同个体在收入、职业、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过程，是社会结构开放度的重要衡量标志。在流动性研究中，收入流动性是研究的焦点。收入流动性包括绝对收入流动和相对收入流动 (Fields & Ok, 1996; Fields, 2006)。绝对收入流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增长问题，增长速度越高，流动程度就越大；相对收入流动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本文中的“流动性”均为收入的相对流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开始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测算流动性的各种方法，其中代表人物有 Shorrocks (1978a, 1978b)、Atkinson (1983)、Fields & Ok (1996) 等，这些方法为估算流动性的大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Dickens (2000) 以 100 等分的收入排序研究了 1975—1994 年间英国的收入流动性。根据其研究结果，由于英国的流动性水平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持续下降，劳动者

改善其收入地位比 20 年前更加困难。不仅是英国，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存在着流动性下降的问题 (Sollogon & O'Donoghue, 2009, 2011)。Cardoso (2006) 进一步分析了流动性下降的原因，认为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措施降低了工资水平的流动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度转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从而使社会收入流动性程度急剧提高。许多学者对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如王海港, 2005; 尹恒等, 2006; 王朝明、胡棋智, 2008)。如果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均处于较高水平 (周兴、王芳, 2010)。

在估算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其趋势进行了判断。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存在下降趋势。王海港 (2005) 利用 CHNS 的收入数据估算了 1989—1997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流动性，得出流动性下降的结论。尹恒等 (2006) 则利用中国社科院 1995 和 2002 年的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 1998—2002 年的收入流动性相对于 1991—1995 年出现了显著下降，且收入流动性的降低使得收入阶层趋于稳定化。严斌剑等 (2014) 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年度调查数据测算了 1986—2010

^{*} 刘志国，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23，电子邮箱：zhiguoliu1103@163.com；马健，科罗拉多大学斯普林斯分校 (UCCS) 商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JL090)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年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承认收入流动性存在下降趋势,但这种下降是在波动中下降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流动性存在上升趋势。王朝明、胡棋智(2008)利用 CHNS 数据,发现 1991—1997 年收入流动性较低,2000—2004 年收入流动性较高。最后一种观点则认为收入流动性变化趋势是比较复杂的,不存在单调上升或单调下降趋势。王洪亮等(2012)利用 CHNS 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在 1989—2004 年,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形变化。罗楚亮(2009)以我国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证明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明显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有上升趋势。

国内学者对流动性趋势的判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这与大家选用的数据样本和调查对象、研究时间段不同及流动性指标本身的多样性有关,人们在多个维度上研究收入流动性,各类指标反映的内涵各有侧重,也会使趋势判断更加复杂。本文利用 CHNS 数据研究了 1989—2011 年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长期变化趋势,并说明在收入流动性下降的大趋势下,各个不同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本文在计算相对收入流动性时主要是选用了 Dickens 指数,该指标根据个人收入的百分位排序来进行计算,同时以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界定居民收入流动性的方向和流动性的质量。

二、相对收入流动性估算方式

收入流动性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提出,但收入流动性较为成熟的估算方式是由 Shorrocks(1978a, 1978b)首先提出来的,Fields & Ok(1996, 1999)则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本文对其中几个代表性指标加以介绍。

(一)Shorrocks 指数

Shorrocks 指数是衡量流动性的重要方式,它可以比较清晰地展示不同收入层次在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流动性指数表示为:

$$M(P) = \frac{n - \text{trace}P}{n - 1} \quad (1)$$

其中, $M(P)$ 代表着流动性的大小, n 表示矩阵的行列数, $\text{trace}P$ 为矩阵的迹,即矩阵对角线上元素的总和。 $\text{trace}P$ 是惯性率指标,因为对角线上的元素意味着期初和期末位置没有发生变化的比例。一般来说,对角线上元素越大,意味着收入位置发生变动的人就越少,惯性越大,因而流动性也就越小。该指标的局限性在于,它只能表明有多少比例的个

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至于离开原初位置的人都去了哪里,相对地位是上升还是下降在此指数上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二)流动性的平等化指数

收入流动性有助于实现长期的收入平等。衡量收入流动性的平等化指数也是由 Shorrocks (1978b)首先提出来的,他将收入流动性看作是长期收入的平等器。他假定 Y_1, Y_n 代表两个时期边际收入分配的向量, G 代表了 n 年的平均收入, $G = \frac{1}{n} \sum_{i=1}^n Y_i$, $I(G)$ 表示的是长期收入分配状况。以 γ 和 μ 表示两个时期的不同权重,其中 $\gamma = \mu(Y_1) / [\mu(Y_1) + \mu(Y_n)]$, $\mu(\cdot)$ 表示不同时期收入的平均值。收入流动性指数表示为:

$$M = 1 - \frac{I(G)}{\gamma I(Y_1) + (1 - \gamma) I(Y_n)} \quad (2)$$

式(2)中, $I(Y_1), I(Y_n)$ 分别表示期初和期末边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如果收入不平等在长期有较大幅度降低,意味着流动性就会比较高;如果期初的不平等在长期内完全消除,则收入流动性指数取最大值为 1;如果长期收入的不平等指数等于各年度不平等的加权均值,则 $M = 0$,是完全无流动性的。在式(2)中, $0 \leq M \leq 1$,如果 $M = 0.1$,也就意味着流动性使不平等程度降低了 10%。 M 值越大,则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幅度越大。

流动性的平等化指数直接表明了收入不平等和流动性的关系,相对于转换矩阵方法计算的 Shorrocks 指数,它抓住了社会分配的全貌,而不仅仅是那些位置没有发生变动的部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不平等指数的多样性,估算出来的流动性会有较大的差异。

(三)Dickens 指数

Dickens 指数是由 Dickens(2000)在分析英国工人收入流动性时提出来的。在分析欧盟国家的收入流动性时,Sologon & O'Donoghue(2009, 2011)和 Cardoso(2006)等也都使用了同样的指标。Dickens 以收入的百分位排名的变化来计算流动性:

$$M_A = \frac{2 \sum_{i=1}^N |R_{it} - R_{is}|}{N} \quad (3)$$

(3)式中, N 是样本数量, R_{it}, R_{is} 分别代表期末(t)和期初(s)样本 i 收入的百分位排序。根据这个指标,如果没有流动性发生, $M = 0$;如果两期收入排名完全负相关,则为完全流动性, $M = 1$ 。

以收入排序变化的绝对值衡量的流动性表明了整个社会收入结构变化的活跃程度,但是不同群体

间收入排序变化方向是多样的,有的群体可能是上升为主,有的群体可能以下降为主。向上流动会改善流动个体的福利,是高质量的流动;而向下的流动性则会带来收入波动的风险,使相关个体的福利状况恶化。为了更好地判断流动性的质量,我们在(3)式的基础上,估算流动性的非绝对值变化 M_{NA} 。

$$M_{NA} = \frac{2 \sum_{i=1}^N (R_{it} - R_{is})}{N} \quad (4)$$

在式(4)中, M_{NA} 值可能会大于0,也可能会小于0。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如果 $M_{NA} > 0$,则意味着净向上流动,该群体总体地位得到改善;反之,如果 $M_{NA} < 0$,则表明该群体流动性方向是向下,其在社会分配中的总体地位是恶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式(4)仅适用于全部样本中按不同分类标准形成的子群体,对于全部样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到目前为止该数据已经进行了20余年的追踪调查,在国内同类调查数据库中,是调查周期相对较长的,涵盖了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共9个年份的调查数据(当年调查所得数据反映的是前一年的情况),为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研究流动性提供了较好的资料。CHNS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城市、城郊、县城、农村4种类型的家庭进行调查,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个人和家庭收入的特征数据。

为了研究长期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我们对CHNS数据进行相应处理。首先,我们从成人数据库中只保留有长期追踪调查的样本,构造了若干平衡面板数据。在各周期中,能够匹配的样本数量见表1。除了估算相邻调查年份流动性以外,我们还将整个数据的调查期间以2000年为界平均分为两段,从这两个阶段流动性的变化观测长期趋势。其次,本文考察长期收入流动性趋势使用的是个体的年收入数据,而不是工资收入数据,因为农民、个体经济只有务农收入和经营收入。在个人收入处理上,将个人的各类收入进行加总,其中包括工资、奖金、补贴和务农收入、经营收入等,因此本文使用的“个人收入”是反映样本当年全部收入的一个综合指标。

(二)样本的分类说明

我国存在着由城乡、所有制、教育、性别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多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除了工资水平的差异外,收入流动性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此我们主要考虑城乡、所有制和学历三种分割因素对于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就城乡因素而言,文中城乡是以居住地而不是以户籍来划分。之所以用居住地来划分,是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居住,甚至已经市民化,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农村户口,以户口来划分可能导致较多的失真。另外,户籍因素在调查数据中存在大量缺失,如果以户籍划分会导致部分合格样本流失。

其次,就所有制分割而言,本文划分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CHNS数据库中,工作单位的性质分为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小集体、大集体、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与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其他和“不知道”等10类。在本文中,我们将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视为国有部门,这些部门具有体制内性质;其余性质的工作单位一律视为非国有部门。

最后,学历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分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历上的差异导致的。本文以有无大专及以上学历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来分析不同劳动者群体收入流动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三)数据磨损与数据磨损的调整

对于较长周期的调查数据而言,存在着样本流失和访问效应问题。样本流失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增,对于使用固定样本的研究可能会产生影响。在样本流失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不同特征的人口会有不同的数据磨损率,可能带有某种选择性。为了校正数据磨损可能带来的偏差,我们以Ayala & Navarro(2011)提出的方法,为观察对象构建一个纵向的权重来对数据加以调整。该权重也可以称之为纵向因子,估算方法如式(5)。

$$W_{i,t} = \frac{1}{p_i} \cdot \frac{N_{i=1}}{\sum (1/p_i)} \quad (5)$$

式(5)中,纵向权重 $W_{i,t}$ 表示一个特殊的观察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已经从数据库中流失的样本,流失的可能性越大的样本,所占的权重也越大。 p_i 是不同调查轮次都保留在样本中的可能性, $N_{i=1}$ 是期初全部的样本。每一轮调查都会产生一个权重因子,每一个观察值相对权重均可以利用权重因子进行修正。

表 1 各不同周期样本匹配数量

期间	匹配样本	城市	乡村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大专以上学历	大专以下学历
1989/1991	7261	2371	4890	3096	3904	147	7114
1991/1993	7079	2104	4975	2595	4272	166	6913
1993/1997	5110	1313	3797	1672	3251	114	4996
1997/2000	6143	1819	4324	1643	3941	215	5928
2000/2004	5201	1557	3644	1237	3233	321	4880
2004/2006	4670	1549	3121	722	2423	233	4437
2006/2009	4371	1341	3030	617	2599	280	4091
2009/2011	5129	1678	3451	741	2993	346	4783
1989/2000	4317	1192	3125	1563	2591	86	4231
2000/2011	3827	1016	2811	826	2559	200	3627
1989/2011	2509	530	1979	794	1626	45	2464

注: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对单位性质回答不明确或没有回答,无法归入“国有”或“非国有”,故二者加总并不一定和匹配样本总量一致。

纵向权重的计算分为三步:第一,通过 probit 模型估计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仅考虑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收入的五等分排序、城乡、是否在国有部门就业等变量对样本是否流失的影响;第二,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估计样本保存下来的可能性 p_i ;第三,根据式(5)计算出保留下来的样本所占权重(不同周期的权重估算结果见表 2),并以该权重对估算出来的收入流动性加以调整。

四、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固化

对于居民收入流动性趋势的考察需要将不同周期的收入流动性加以比较。为了避免流动性估算过程中不同方法所造成的偏差,我们按照三种不同方法进行估算,并加以比较,结果见表 2。首先分析 1989/1991 和 2009/2011 两个周期流动性的变化。这两个周期分别位于整个调查数据的最初一期和最

后一期,我们略去流动性变化的中间过程,可以看到收入流动性变动的总体趋势。根据 Dickens 指数计算的收入流动性,1989/1991、2009/2011 的收入流动性根据权重调整后指数分别为 0.474 和 0.378,下降了 20.3%(调整前该指数下降了 19.3%)。为了验证流动性下降的结论,我们将整个调查周期以 2000 年为界限平均分为两个阶段,1989/2000、2000/2011 流动性分别为 0.565 和 0.509,流动性水平下降了 9.9%。

Shorrocks 指数是以收入五等分矩阵来估算的。从 2 年间隔的流动性来看,1989/1991、1991/1993、2004/2006、2009/2011 流动性分别为 0.91、0.906、0.816 和 0.826,虽然在最后一个周期有小幅提高,但是通过 3 年、4 年、10 年几个不同周期的流动性加以比较,总体上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

如果以平等化指数来衡量,收入流动性下降趋势尤其明显,从 1989/1991 年的 0.18 下降到 2009/

表 2 不同方法衡量的流动性指数比较

期间	权重	Dickens 指数		Shorrocks 指数		平等化指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989/1991	0.995	0.477	0.474	0.910	0.905	0.180	0.179
1991/1993	0.997	0.467	0.466	0.906	0.903	0.082	0.082
1993/1997	0.981	0.491	0.482	0.923	0.905	0.138	0.135
1997/2000	0.998	0.464	0.463	0.902	0.900	0.104	0.104
2000/2004	0.959	0.446	0.428	0.899	0.862	0.073	0.070
2004/2006	0.969	0.374	0.362	0.816	0.791	0.061	0.059
2006/2009	0.985	0.408	0.402	0.856	0.843	0.108	0.106
2009/2011	0.981	0.385	0.378	0.826	0.810	0.071	0.070
1989/2000	0.960	0.565	0.542	0.965	0.926	0.292	0.280
2000/2011	0.961	0.509	0.489	0.912	0.876	0.175	0.168

2011年的0.071,下降幅度接近60%,也就是说,收入流动性作为“平等器”促进收入平等化的效能大大下降了,在1989/1991两年间,收入流动性可以使期间收入的不平等下降18%,而到了2009/2011,流动性只能使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7.1%。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将全部调查周期(1989—2011)分为两个时间长度相等的阶段,前一阶段收入流动性为0.292,后一阶段为0.175,下降幅度为66.9%。以平等化指数表示的流动性以最直接的方式表明了收入流动性水平的下降,对于改善长期收入不公平的效果下降。

表2中,根据不同指数估算出来的收入流动性都存在下降趋势,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整体的固化趋势。收入流动性下降使社会的收入分层越来越明显,中低收入阶层的上升空间在变小,上升速度在变慢。当中低收入阶层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被堵塞的时候,一方面会使社会共识出现断裂,甚至出现“仇富”和“欺贫”两种对立的、不和谐现象,另一方面使社会进步的激励机制失灵,“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气被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消极声音所取代。收入流动性下降意味着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困难,但是,它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冲击是不一样的。

五、流动性下降对不同收入群体上升空间的影响

(一)流动性下降对中间收入阶层上升空间的挤压

收入流动性下降只表明了社会各收入阶层地位改变的难度在上升,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冲击还需要具体分析。为分析收入流动性下降对各收入等级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1989/2000、2000/2011两个阶段五等分收入转换矩阵来分析收入分配各阶层的流动状况,具体见表3、表4。它们除了间接反映出两个阶段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以外,我们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各阶层相对位置的变化。

首先,对于1989、2000年处于底层20%的居民来说,进入高收入阶层(V)的概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甚至2000/2011相比于1989/2000还略有提高。在这两个阶段中,低收入阶层(I)分别有54.02%、59.27%仍然处于低收入(I)和中低收入(II)阶层,说明低收入者向中间阶层流动变得困难。

其次,对1989、2000年处于顶层20%的居民(V)来说,前后两个阶段的流动表现出了较大的差

异。从顶层收入阶层地位维持的角度看,1989/2000顶层20%样本有26.97%仍然留在高收入阶层,下降到中高收入阶层(IV)的为22.11%,即1989年的高收入群体在2000年有49.08%处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在第二阶段(2000/2011),2000年时的高收入群体到期末时有39.16%仍然处于高收入阶层,比第一阶段要高出31.1%;仍然处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比例为65.53%,比第一阶段高出25.1%。

就顶层收入的向下流动而言,1989年的高收入居民到2000年将近3/4的个体收入地位都不同程度下降了,甚至有32%进入到最后两个等级的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2000年的高收入居民到2011年则只有19.06%的家庭进入到底部的两个收入层次。

最后,从收入转换角度来看,上升空间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收入层级处于第40%~80%分位数之间的居民,即III、IV两个等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间阶层。III层次进入到高收入阶层(V)机会由第一阶段的20.97%下降到第二阶段的14.77%,下降幅度为29.6%,IV层次进入到高收入层次的机会由29.78%下降到23.4%,下降了21.4%。

表3 1989/2000五等分收入转换矩阵

2000 1989	I	II	III	IV	V
I	31.02	23.50	21.30	13.54	10.65
II	20.97	26.88	22.60	17.84	11.70
III	17.61	18.31	20.39	22.71	20.97
IV	14.37	15.30	16.80	23.75	29.78
V	16.09	15.97	18.87	22.11	26.97

表4 2000/2011五等分收入转换矩阵

2011 2000	I	II	III	IV	V
I	33.81	25.46	18.67	11.23	10.84
II	26.54	25.36	20.13	16.08	11.90
III	19.35	23.92	22.75	19.22	14.77
IV	11.50	15.03	23.01	27.06	23.40
V	8.88	10.18	15.40	26.37	39.16

五等分收入转换矩阵是把样本平均划分为五个收入层级,并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各阶层的变化趋势,尤其是中等收入上升空间受到较大影响。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收入为标准将社会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样本量不等的收入层级。在收入分层上,我们采用Scott & Pressman(2011)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以中位收入为

参照,介于中位收入的 75%到 125%之间为中等收入阶层,低于 75%和高于 125%的分别为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我们可以通过表 5 中 3 个收入层级的转换直接看到不同层级的流动性。

表 5 各收入层级的收入转换(1989/2000)

1989 \ 2000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53.49	21.79	24.62
中等收入	34.98	20.73	44.28
高收入	31.29	18.42	50.28

表 6 各收入层级的收入转换(2000/2011)

2000 \ 2011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51.92	23.58	24.50
中等收入	38.91	27.88	33.21
高收入	20.50	22.45	57.06

从表 5、表 6 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就两个阶段的低收入阶层来说,进入到高收入阶层的比例没有变化,只是流动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略有提高。中等收入阶层进入到高收入阶层的比例从 44.28%下降到 33.21%,下降幅度为 25%;与此同时,中间收入向下流动到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却由 34.98%上升到 38.91%,上升了 11.2%。高收入阶层在第一阶段有 50.28%仍然能够维持原有的收入地位,第二阶段该比例上升到 57.06%,上升了 13.5%;第一阶段从高收入向下流动到低收入的比例从 31.29%下降到 20.5%,下降了 34.5%。

通过对表 5、表 6 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和表 3 几乎相同的结论,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在前后两个阶段差异不显著;高收入阶层是明显的受益者,维持其收入优势地位不变的比例更高,而下降到低收入阶层比例大幅下降。中间阶层是收入流动性趋势变化的最大受损者,向上流动更难,向下流动更易。高收入阶层优势地位的持续巩固和中间阶层上升空间变小成为流动性下降两个直接反映。由于中间收入阶层往往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比低收入阶层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因此,我们在通过大众媒体感受到低收入阶层的无奈和高收入阶层优越感的同时,更多地可以感受到中间收入阶层的焦虑。

(二)流动性下降对不同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群体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割,流动性下降对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劳动者群体影响是不同

的。由于数据磨损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为了能够较为准确反映流动性的变化,表 7 给出了五个典型周期不同人群经过权重调整后的收入流动性。该流动性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在总体流动性中的表现,其处理方式是首先将所有样本的收入按照百分位进行排序,然后以 Dickens 指数分别计算不同群体的流动性,并以样本的平均权重加以调整。在流动性估算过程中,使用了绝对值和非绝对值两种方式,前者估算出了流动性的大小,后者是某一群体向上与向下流动相互抵消后的余值,可以用来判断该群体的流动方向和流动质量的高低。

1. 流动性下降对城乡分割所造成的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我们首先分析城乡分割导致的不同群体流动性差异。从表 7 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流动性特征:(1)1989—2011 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趋势总体是下降的,这和尚娟、王璐(2013)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从 1989/1991 到 2009/2011 农村和城市居民调整后的流动性水平分别下降了 12.6%、52.8%,城镇居民流动性下降幅度比农村居民大得多。(2)城乡居民流动性质量发生了重要变化,流动方向甚至产生逆转。1989/2011 整个数据调查周期内,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 31.9%,农村居民不仅流动性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其净流动性是向下的,意味着农村居民在 20 多年时间里总体排序是下降的,城镇居民则是总体改善的。但是分阶段来看,城乡居民的净流动性却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的净流动性 2000 年后转为负值。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 2002 年以后,农民的非农收入上涨较快,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支农力度,减免和废除了农业税,提高了农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水平,从而使农民收入增加。对城镇居民来说,流动性下降的同时,产生了净向下流动。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改变其自身不利处境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而且不进则退,收入相对地位甚至恶化。因此,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对于上升的空间变小会感受更为深刻。

2. 流动性下降对所有制分割所造成的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流动性下降对于所有制分割所造成的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差异通常也是我们所称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①。进入国有部门比进入非国有部门的门槛更高,各种歧视性限制更多,除了学历、户籍、性别以外,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及在国有部门的晋升还依赖于是否掌握更多的“关系”资源。

表7 不同劳动力市场样本根据权重调整后的收入流动性

期间	计算方法*	农村	城市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有学历**	无学历	底层20%	顶层20%
1989/2011	(1)	0.462	0.679	0.591	0.466	0.746	0.517	0.614	0.596
	(2)	-0.004	0.029	0.072	-0.026	0.008	-0.004	0.581	-0.569
1989/1991	(1)	0.512	0.402	0.356	0.559	0.240	0.477	0.577	0.551
	(2)	-0.018	0.039	0.039	-0.049	0.142	-0.004	0.528	-0.486
2009/2011	(1)	0.404	0.320	0.220	0.461	0.192	0.391	0.467	0.337
	(2)	0.021	-0.047	-0.029	0.007	-0.029	0.002	0.418	-0.285
1989/2000	(1)	0.516	0.597	0.555	0.526	0.606	0.542	0.638	0.603
	(2)	-0.012	0.041	0.103	-0.054	0.412	-0.007	0.604	-0.568
2000/2011	(1)	0.481	0.514	0.449	0.509	0.451	0.491	0.554	0.527
	(2)	0.022	-0.008	-0.093	0.025	0.116	-0.006	0.513	-0.474

注：*表中计算方法(1)(2)分别是依据公式(3)(4)计算,计算结果使用各子群体的权重加以调整。方法(1)计算的结果为流动性的绝对值;方法(2)计算的结果大于0时为净向上流动性,小于0时为净向下流动性。文中不特别说明为净流动性时,则是指方法(1)的计算结果。**这里学历指的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

表7给出了两个部门流动性变化的不同特征:(1)两个部门的流动性趋势都是下降的,国有部门收入流动性下降幅度更大。从1989/1991到2009/2011国有部门流动性下降了40.6%,非国有部门下降了17.5%;如果以更长的周期1989/2000和2000/2011两个阶段比较,两个部门流动性分别下降19.1%和3.2%。(2)两个部门的流动性质量存在着差异。从两个部门1989/2011总体的流动性来说,国有部门的流动性高于非国有部门21.2%。但在此期间,两个部门的净流动方向上存在差异,国有部门是向上的,非国有部门则是向下的。换句话说,国有部门流动性低,收入更稳定;非国有部门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低,需要承担较大的收入波动风险。(3)流动的方向在2000年以后在两个部门间发生了逆转。1989/1991、1989/2000这两个阶段,国有部门的净流动性都是正值,是正的向上流动,非国有部门则是净向下流动性。2009/2011、2000/2011两个后半期的阶段净流动性发生了逆转,国有部门转为了净向下流动。

由于国有部门的优势不是仅体现在收入优势上,而是体现工作环境、社会声望、隐性福利等方面,这些指标无法在收入上反映出来,这样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流动性下降使国有部门职工觉得收入上升的空间变小,而且还存在着总体收入排序向下的问题,收入波动风险比以前加大;二是非国有部门收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供求形势的改变,总体收入流动呈现出一定的向上的特点,但是流动性下降也使其感觉改变其收入的不利地位更加困难。因此,收入流动性下降使国有部门和非国有

部门都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国有部门劳动者不满意于收入相对地位的下降,非国有部门劳动者则渴望类似于国有部门就业与收入的稳定性。

3. 流动性下降对学历水平差异所造成的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由于受到大专以上学历个体的样本数量限制,从表7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显得比较复杂,但是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首先,对于所有劳动者来说,无论是有还是没有学历,共同特征是流动性存在着下降趋势。其中,有学历的劳动者流动性下降更快。2000/2011相比于1989/2000的流动性,有学历的劳动者流动性下降了25.2%,没有学历的劳动者只下降了9.4%。其次,流动性的质量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1989/2000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净向上的流动性为0.412,2000/2011则为0.116,净向上流动下降了72.6%;与此同时,无学历的劳动者净流动性是负值,即收入的相对状况是恶化的。对于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来说,相对收入地位改变变得困难,而无学历的收入地位总体水平则会相对下降。因此,无论是有还是没有学历,都会表达对流动性下降的不满,其中高学历者受到的影响更大。

六、结论

本文利用CHNS数据,以Shorrocks指数、平等化指数和Dickens指数等不同指标估算了居民收入流动性。从总体上看,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相对放慢,利益结构趋于固化,收入流动性出现较大比例地全面下降,虽然在个别年份流动性有小幅反弹,但是改变不了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一般趋势。

流动性的下降对不同的收入等级来说影响是不均衡的。顶层收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得到持续巩固;中下阶层的上升通道相对改变不大。受到流动性下降影响最大的是中间收入阶层,他们的上升空间受到了大幅挤压。

就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收入流动性的下降使其上升空间变小都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城镇居民来说,2000年以后,甚至产生了净向下流动,收入的相对状况是恶化的;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则由于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其状况得到改善,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改善的。对国有部门职工来说,流动性已经为负值;而对于非国有部门职工来说,较高的流动性水平往往意味着较大的收入风险。就有无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来说,有学历的劳动者收入上升难度大大幅度增加,而无学历的劳动者则出现收入相对下降的问题。

收入流动性下降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固化,使现有的分配格局更加难以改变。流动性下降所导致的上升通道变窄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焦虑。因此,促进社会流动性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要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因素,以市场化来配置资源,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

注:

①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国有部门并不能和体制内部门简单地等同,因为我国国有部门还存在着特殊的编制问题。我国国有部门职工可以有编制内、编制外的区别,甚至编制外还有合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等多种用工形式的区别。严格地说,只有国有部门编制内人员才符合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特征。由于缺乏“编制”的相关数据,只能以是否在国有部门做近似的分析。

参考文献:

罗楚亮,2009:《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研究》,《财经科学》第1期。
尚娟 王璐,2013:《基于CHNS数据的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王朝明 胡棋智,2008:《中国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基于多种指标测度》,《管理世界》第10期。

王海港,2005:《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王洪亮 刘志彪,2012:《中国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基于收入流动性的微观计量》,《世界经济》第1期。
严斌剑 周应恒 于晓华,2014:《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经济学(季刊)》第3期。
尹恒 李实 邓曲恒,2006:《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周兴 王芳,2010:《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管理世界》第5期。
Atkinson, A. (1983),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Ayala, L. & C. Navarro(2011), “Cross-country income mobility comparisons under panel attrition: The relevance of weighting schemes”, *Applied Economics* 43(25):3495—3521.
Cardoso, A. R. (2006), “Wage mobility: Do institutions make a difference”, *Labour Economics* 13(3):387—404.
Dickens, R. (2000), “Caught in a trap? Wage mobility in Great Britain: 1975—1994”, *Economica* 67(268):477—497.
Fields, G. S. & E. A. Ok(1996),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1(2):349—377.
Fields, G. S. & E. A. Ok(1999),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in: *Handbook of Income Inequality Measuremen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Fields, G. S. (2006), “The many facets of economic mobility”,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articles/230>.
Scott, R. H. & S. Pressman(2011), “A double squeeze on th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5(2):333—342.
Shorrocks, A. (1978a), “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 *Econometrica* 46(5):1013—1024.
Shorrocks, A. (1978b),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2):376—393.
Sologon, D. & C. O’Donoghue(2009), “Increased opportunity to move up the economic ladder”, <http://repec.iza.org/dp4311.pdf>.
Sologon, D. & C. O’Donoghue(2011), “Shaping earnings mobilit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8(2):175—202.

(责任编辑:钟培华)